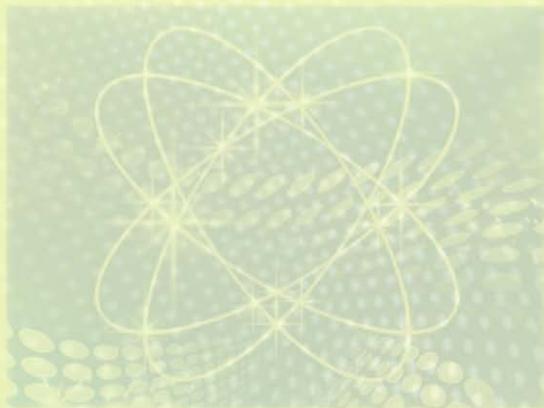


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

王 奇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王奇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117-0514-3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俄关系-边界问题-研究-历史

IV. ①D829.13 ②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9563号

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文 莲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40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内容提要

中俄国界问题曾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时特别关注的要害问题，因而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长期以来，中俄两国学者围绕两国国界东段形成的历史依据——双方所签署的一系列相关双边条约的内涵、外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西方学者也有大量相关成果问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书对中俄两国学者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历史反思，希望对当今及未来处理邻国间关系，特别是处理敏感而复杂的国界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

王奇，1986年获北京大学学士学位，1995年获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是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青年学者。近年来出版专著《中苏同盟启示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主编《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发表的论文主要有《中国学者有关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问题研究述评》（载于《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其俄文版载于《开阔的学术视野：纪念齐赫文斯基院士90华诞》，莫斯科：历史思维的丰碑出版社，2008）及《中国学者有关俄国文化之研究（2000—2007）》（载于《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其俄文版载于《当代俄罗斯有关中国问题之研究现状》，莫斯科：俄罗斯全景出版社，2007）等。

序言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薛衔天

中俄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邻国，从 17 世纪初裴特林使华算起，两国已有近四百年持续不断的交往史。期间，中国经历了明清两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俄国则经历了沙皇统治时期、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在各个不同时期，中俄两国学者对两国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特别是领土问题进行了潜心研究，积累了大量著作。对中俄学者有关中俄关系历史研究的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说研究中俄关系学术史，理出两国学者研究的发展脉络，比较双方研究的异同，检讨他们研究的得失，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使研究者得到借鉴和警惕，无疑是推动中俄关系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中俄关系史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笔者在主编《中俄关系中文文献目录（17—20 世纪）》时，力图反映出中俄关系学术史的发展线索，就是期望能尽快看到有关中俄关系学术史的研究著作，来填补学术空白。王奇撰写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下称王著），抓住中俄国界变迁这一核心问题，梳理出几百年来两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大致轮

廓，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我国中俄关系学术史研究的空白。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王著所做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比研究某一历史阶段的中俄关系史或某一方面问题的难度要大得多。尽管作者将研究范围限制在国界研究，但因国界问题是中俄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贯穿两国关系的主线，因此，可以说中俄两国学者的主要著作几乎无不涉及这一问题，因而必须搜集和研读几百年来中俄学者的相关著作。从米勒研究西伯利亚论著问世算起，俄国对中俄国界研究有两个半世纪之久，中国从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算起也有 150 多年的历史。中俄有关论著之丰富如汗牛充栋，从中撷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比较研究，得出必要的结论，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是对作者全面学养的重大考验。作者不畏困难，在尚无人涉足的研究领域施展自己的学力，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实在令人赞叹。

王著将中国学者对中俄国界东段研究划为四个规模期：清政府时期（19 世纪中叶—1911 年），民国时期（1911—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分为 20 世纪 50—8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中期至今两个时期。这种时期划分看似简单，但要将各个时期中俄国界东段的研究状况准确地勾画出大致的轮廓，确实是很困难的工作，没有对各个时期中国学者研究著作的全面了解是做不到的。从何秋涛开始，作者对清代研究中俄关系的著名人物和学者如洪钧、钱恂、曹廷杰等的著作一一加以重点评述，还将徐元文、徐景福等这些研究中俄国界、却较少被注意到的官员，列入早期研究中俄关系代表人物的行列，并列举出研究者很少使用的清政府印行的档案文件集；作者对民国时期中俄关系学术著作的评述也不乏独到之处。这一切使读者

对建国以前的研究状况能够有全面的了解，并在这一领域增加了许多新认识。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真正繁荣时期还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二三十年期间，由于思想解放，学术禁锢取消，科研条件大大改善，中俄关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作者概括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为：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注重解读中俄界约，利用原始文献分析中俄国界形成史，强调理性化的科研态度和研究方法，无疑是非常准确的。作者几乎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一一做出评论，清晰地描绘出这一时期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盛况。学术争论是学术禁锢取消、学术繁荣的重要表现。这一时期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研究中最重要争论发生在刘远图和吕一燃两位学者之间。刘远图先生对《尼布楚条约》做出新的解读，对按条约划分中俄国界东段走向和乌第河未定界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而吕一燃先生不同意这些看法，指出刘的根据有 5 处不符合历史事实。作者将双方的主要论点摆明，不做结论，将问题留给读者去继续研究，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态度。

对俄国方面的研究情况做出比较全面和准确的评述更为困难，因为这不仅需要作者有较好的俄文素养，而且还要求作者必须亲赴俄国图书馆查找必需的文献。作者利用留俄及后来数次访俄的机会，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查寻并研究在国内找不到的俄方文献，对 200 余年俄国学者研究中俄国界问题的基本状况得出基本恰当的结论，为国内研究者探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捷径。作者指出，米勒对《尼布楚条约》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划分“不明确”、中国占有黑龙江地区是“毫无根据”的论断，成为后来常被俄（苏）学者用来评价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依据；沙皇政府为巩固和加强据《瑷珲条约》和《北

京条约》新占领的 100 余万中国领土，支持一批官员和学者对黑龙江地区和乌苏里江地区进行考察，出版大量记述性的书籍和文章，说明帝俄时期俄国有关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的研究是为沙皇政府领土扩张政策服务的，“这就很难还历史于客观、真实的面目”。对苏联时期的研究状况，作者清晰地指出苏联对华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在苏联早期和中苏蜜月时期，有一些苏联学者敢于说出实话，他们承认《尼布楚条约》是平等条约，谴责沙俄的侵略行径，承认沙俄据《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所占领的土地是中国领土。作者通过大量引用苏联学者的论述加以充分证明。但从上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对华实行舆论一律，以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为代表的苏联学者为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进行辩护，苏联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研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作者得出结论说：在苏俄时代和上世纪 50 年代“苏联学者有关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的研究基本是沿着正常的学术轨迹发展的；而进入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尽管研究成果的数量激增，但其成果明显打上了服务于政治的烙印，因而缺乏理性且有悖于学术研究客观性原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学术动向是国内学者最为关心的。作者对此问题做了一分为二的剖析：一方面指出，“中苏两国交恶时期假‘学术’之名相互指责、攻击的现象得到了抑制，理性思考也在不断增多”；同时指出，“有关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研究的主流认识仍沿袭着俄国传统观念”。作者总结说，尽管俄国经历了帝俄、苏俄—苏联、俄罗斯联邦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其主流观点有明显的继承性，这是一个更深

层次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及其民族性格问题，是历史的合力使然”。在中俄国界问题上俄国的传统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民族利益至上原则，将俄罗斯民族利益作为自己所从事的中俄边界问题研究的是非标准。他们为了证明沙俄侵略扩张的合理性，不顾客观事实歪曲《尼布楚条约》的性质，说该条约是对俄国的不平等条约。如何评价《尼布楚条约》是研究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的核心，从米勒到米阿斯尼科夫院士这一派学者否定《尼布楚条约》的平等性质，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瑛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证明沙俄据《瑛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取中国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收复失地”。持这种观点的俄国学者最符合俄国的民族利益要求，因此他们一直是俄国的主流学者，他们研究中俄国界问题上的立场观点，不会因中俄国家关系改善而发生变化。王著还特别介绍以沃斯克列先斯基为代表的一派俄国学者的观点，沃氏认为，“苏中及其以后俄中两国首脑会晤为两国关系中不愉快的往事划上了句号”，最重要的是向前看，共同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难题。“今后，关于边界形成史问题的争议和俄中关系史上的种种争议问题将脱离双边国家关系的领域，这些问题应当是学者们科学分析和讨论的对象”。作者通过对米阿斯尼科夫和沃斯克列先斯基等学者在苏联解体后所发表论著的解析，使中国同行对对方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动向有了较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是在新领域进行探索的著作，难免有一些不足和缺憾之处。例如，对中俄双方划分的几个规模期，应当着重分析每一个规模期标志性的著作，指出该著作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及其时代特点，突出学术发展脉络，这

样就可以避免产生简单地以历史时期作为学术发展阶段的误解。再如，作为第三方西方学者的著作，对我国学者获得新的视野和理念，进一步客观地研究中俄国界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广泛地搜集了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和论文的题录，也综合指出西方研究著作的特点，但尚未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具体评析，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

2008年10月《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中俄两国研究中俄关系史同行的重视，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俄国学界决定出俄文版。这次中文版（第二版）和俄文版分别在中俄两国同时问世，就是对本书的学术价值最好的肯定。书中的错漏也受到了批评。作者对来自各方面赞扬表现十分谦虚谨慎，对于批评则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不以“瑕不掩瑜”来降低对自己的要求，重新对全书进行认真审订，交出版社再版。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令人钦敬。作者有很好的学术功底，正当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特别是有良好的治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一定会在中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更重大成绩。

在本书付梓之前，有幸看到我尊敬的朋友索科洛夫教授为俄文版写的序言。他指出了在世界历史上国界形成的种种复杂情况，只有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理性地对待现实，放开眼界朝前看，才能维护和谐的国家关系与世界的稳定。他表现出负责任历史学家的应有风范。该序言被完整准确地译成中文，中国读者从而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索科洛夫教授的观点。他们会发现，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形成，本人这篇序言的观点与索科洛

夫教授的观点完全不同，这完全是学术争论。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今天的中俄友好边界。俄文对“学术争论”称“科学争论”。科学争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科学态度的起码要求就是要完整准确地对待对方不同的观点，不能各取所需地加以删割。我不同意你，但我尊重你。王奇的专著之所以受到中俄学者的重视，就在于她比较准确和完整地介绍了中俄学者的观点。趁此机会，先与尊敬的朋友索科洛夫教授做一初步的学术交流。

2010年3月

序言二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现代史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学博士 教授 安·康·索科洛夫

在介绍中国学者王奇有关研究俄中国界东段问题的论著之前，有必要指出边界问题本身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国家边界按其定义是指划分邻国领土的界限。它可以是自然形成的，例如：河流、山脉；也可以是边防部队用于保卫边界构筑的防御工事；有时还可能只是跨越海洋空间的纬线或者经线。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边界问题与民族及国家关系史密不可分。

边界概念的正式提出源于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罗马帝国开始衰落，因此需要借助天然屏障（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和边界要塞形成抵御野蛮入侵的防线。但如果不是欧洲中心论者，那么就可以联想一下中国的长城，长久以来，长城保护着中国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

正如王奇在本书开篇中所指出的那样，包括近代在内的边界形成史是很模糊的。可以想象出，史学家们当时在地图上标注边界时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15世纪末，欧洲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伴随而来的是领土的扩张。强国把弱国变成自己的附属国，将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强加于附属国，按所谓的

“强权法”为附属国设置边界。如果强国连其所认可的附属国个别当政者的意见都不顾及的话，那么何谈当地土著居民的意见呢？

事实上，19世纪末之前世界已经被老牌殖民帝国瓜分完毕了。18世纪前，西班牙和葡萄牙遥遥领先。他们征服了新大陆，在亚洲侵占殖民地，而且还渗透到了中国。从18世纪开始，接替他们的是大不列颠帝国，占领了地球上约五分之一的领土，包括整个北美洲和大洋洲。法国及荷兰也占领了大片殖民地。18世纪末，英国在美洲东北沿岸的殖民地脱离了宗主国的统治，成立了独立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后者在领土扩张方面也没有袖手旁观。

美国的历史对王奇书中所涉及的观点很有借鉴意义。这个国家19世纪领土的扩大基本上是靠侵占美洲土著民族的土地，同时，还通过同日渐衰落的西班牙帝国签约，迫使其放弃对墨西哥的统治。在美国史学中出现了“边疆”理论（源于“边界”一词），按照美国人的观点，开发边界地区、使中部和遥远的西部地区殖民地化，这是美国历史的特点。众所周知，这段历史回味起来意义非凡，尽管美国人千方百计地竭力证明自己无罪且颇具理想主义色彩。

此后，也是由于历史原因，加入殖民地占领的还有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而在此之前的各殖民帝国间的边界已经确定，并没有出现新的侵略强国来参与瓜分世界。新、老殖民帝国为重新瓜分世界、重新划分边界进行争斗，导致出现前所未有的国际冲突，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研究了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因此，不能说这一理论是没有根据的，尽管目前在俄罗斯很多作者试图对此避而

不谈。

战败的德国丧失了自己的殖民地，停止了向东方（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扩张。但是在复仇主义的浪潮中，日尔曼民族优于其他民族观点的倡导者——希特勒掌管了德国政权。希特勒把复仇主义变成了统治世界的思想，把占领欧洲的俄国作为德国必需的生存空间，以此扩大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其追求领土扩张的同盟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如今人们对侵略者们当时是如何瓜分世界、如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进行国家和边界的重新划分都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一侵略计划只能通过苏、美、英、法、中及其同盟国的获胜才能终止。

战争结果所确立的世界新秩序（雅尔塔、波茨坦及其他会议上的决议）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上，战胜国试图在公正和平等的原则上解决这一问题，认为边界神圣不可侵犯，指出重新划界有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然而，并不能说，各个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明确战后边界架构时必须考虑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20世纪一系列国家发生了革命，导致其社会制度发生改变，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确立了国际关系新原则。俄国1917年发生了革命，其结果是在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联盟国家——苏联，苏联力量和实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恐惧，甚至出现了“苏维埃帝国主义”的观点，而这一观点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革命必然胜利论。不过，托洛茨基提出的“输出革命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论点还是遭到了谴责，那么“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就放到了首要位置。1949年历经民主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

的中国越来越步入世界领先行列，其所遵循的也是上面这一原则。与此同时，俄国的社会制度再一次发生改变，苏联和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第二，殖民帝国的崩溃、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新兴独立国家的诞生，无不围绕划界问题发生了不止一次的战争和冲突，这些都是因处理旧殖民地所留遗产而引起的。

第三，充斥着战争且不断地重新划分边界的以往的历史远非总是公正和有理可据的，这就导致了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中试图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边界的争议问题。这个理论在关于二战后制定的边界不可破坏的纲要中已经有所反映了，这一点在一系列国际协定中可以得到证实。实际上，这一原则并非总被遵循，而且每一次边界的重新划定总能从历史、经济、政治或其他方面找到理由。

以上所列举的情况都使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局势和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改变，这些变化明确了国与国之间边界架构的相互关系。可以想象，如果按照历史公正性原则重新进行边界划分的话，世界将被怎样的混乱状态所笼罩。

诚然，围绕这一切问题出版了大量国际关系史著作，其中涵盖了相关国家在对外政策领域所签订的合同、协议、公约等内容。不难理解，这些著述中的绝大部分因作者的国籍不同而都在为自己国家的政策和边界立场进行辩护。值得赞赏的是王奇在其俄中边界史著作中努力做到从各个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中国作者的著作里是如何论述这个问题的，俄罗斯和前苏联学者有关远东边界问题的著作中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在那些似乎是态度公正并且貌似扮演“仲裁者”的第三国（西方国家）的眼里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在王奇的书中为大家

描绘出一幅五彩斑斓、充斥着争议和矛盾的国际关系画面，而在欣赏这幅画的同时，人们不能不倾听和接受王奇的呼吁：在解决俄中边界问题的态度上，我们必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针对书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我想谈以下几点。书的名称是《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书的内容描述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东北地段的边界问题。对于俄罗斯学者来说这完全是另一个研究方向。关注的中心是阿穆尔河^①与乌苏里江 4300 公里的国境线。在帝俄和苏联时期，它曾被称作远东边界，把中国同俄罗斯远东、阿穆尔河沿岸地区 and 后贝加尔地区分割开来。它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仍旧存在，严格意义上说，远东边界问题就包含了所有的俄中边界问题。这样一来，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需要调整边界方面问题的“邻居”大大减少了。

中国和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指的是人口，而俄罗斯指的是领土面积。两国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巨大的影响。国际关系中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两国是否成功地解决边界问题。看来，应当从现代俄罗斯研究人员的观点出发，他们不受历史、政治和民族偏见约束，指出一些对于正确理解俄中边界问题有重要意义的俄国历史的特点。

没有特别的根据认为，两个国家的相互关系本质上与世界历史的共同进程不一致。俄国领土的扩大早在俄国统一国家形成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其他许多经历过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国家也大致如此。这里应就其中的一系列具体特点加以阐释。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领土的急速增长，顺便说一

^① 在中国段称黑龙江。——编者注

下，这不完全是在帝国时期。商人—实业家斯特罗加诺夫雇佣哥萨克叶尔马克首领“征战西伯利亚汗国”之后，在16世纪末俄国人开始渗入西伯利亚。在这短暂的历史时期，大约用了半个世纪，俄国哥萨克和新的疆土开拓者们的部队就已经到达了太平洋海岸，而在17世纪中叶贝加尔湖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领土已经开始属于俄国。在17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到达阿穆尔河并由此首次来到直接与中国接壤的地方。自然，就产生了两国的边界问题。在与中国皇帝为争夺阿穆尔河流域地区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势下，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俄国人离开这一地区。

当然，这个条约被中国学者视为平等条约。但是谈到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平等，就如同谈论征服当时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一样，是不合适的。同样，这还涉及后来签订的边界条约。评价它们的公正性与不公正性、平等和不平等，就如同王奇书中所提及的中国学者们的观点，似乎完全不是富有成效的方法，而只能招致领土争端。事实上，这些条约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力量格局，允许强大的国家迫使他国接受自己的条件，当时的历史正是如此。这涉及《瑛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根据这两个条约，远东在1850—1860年期间归属俄国，国界已经划分，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边界。中国学者之正确在于，不一定要对1917年革命前俄帝国对中国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加以否认，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满清王朝统治行将结束的衰败时期。这是历史，而不应带着今天的情绪去加以接受的历史，需要考虑时代特点和历史背景，况且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时期。当然，这非常牵强。同时有怀疑认为，如果当时中华帝国是个强国，是否也会实行某种别的政